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9.04.007

从后殖民视角看小说《耻》中的边缘群体^①

丁建新,陈柳

(中山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库切的小说《耻》展现了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社会面貌。在新南非的后殖民语境中,白人失去了话语权和土地,与动物他者一样沦为边缘群体。后殖民主义为种族他者发声,而后殖民生态批评则将关怀的范畴扩展至动物他者。在这两种学说所构成的后殖民视角中,南非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种族他者与动物他者的边缘境遇得以审视。在库切的叙事中,动物生存范式对于边缘群体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关键词:库切;《耻》;边缘;南非白人;动物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9)04-0042-08

“库切是当代社会中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他立足于边缘。”^①他的作品常展现出对他者、对边缘的关怀和思考。“主题上,(库切)的作品通常展现他者如何被噤声;技术上,他的叙述策略让被噤声者恢复生气,让读者看到南非的另一面。”^②库切对欧美帝国主义的批判、对边缘群体的关怀与后殖民主义及后殖民生态批评是一致的。两者都强调跳脱出殖民化的思维框架,从新的角度叙述世界,以期达到真正的全球正义。后殖民话语是为边缘群体谋求正义的话语。库切的小说《耻》站在边缘的立场,揭示了去殖民化的新南非并没有挣脱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和谐的南非社会面貌,这一如铁般禁锢的制度使得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失去了柔软的可能。殖民时代,白人的优越感建立在黑人为奴的基础上,而后殖民时代,黑人成为中心的前提是将白人置于险象环生的边缘。中心与边缘调换了位置,掠夺与压迫的本质却毫无变化。对库切来说,厘清动物与人的关系、正视物种歧视的危害,对于消除种族仇恨具有重

大意义。在其自传性作品《男孩》中,库切回忆他小时候曾因为将一张糖纸扔出车窗外而深感后悔。他想象着被丢弃的糖纸飞旋在冰冷的深渊与空寂之中,他决定在他死亡之前,有一天一定要去拯救这张糖纸。“这种情怀中隐藏着对被压迫、被遗弃和不受重视的微小存在的关切。”^③对一张糖纸,库切尚有如此悲悯之心,他对其笔下的社会弱势群体的责任感更可见一斑。

一 南非白人:从中心到边缘

自17世纪开始,南非被荷兰和英国长期占领和统治。在这一有着双重殖民史、多民族共同生存的地方,不同话语的力量此消彼长,互较量。南非白人作为早期殖民者的后裔,与当地黑人的矛盾复杂而久远。白人殖民者“利用国家机器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制定了一系列种族主义法律、法令和政策,如《禁止混婚法》《不道德法修正案》《人口登记法》等,强化了对有色人种,尤其是对黑人的歧视和压迫,造成了黑人与白人之间难以平复的裂痕”^④。在近半个世纪的隔离时代中,白

① 收稿日期:2019-04-22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GD15XWW28)

作者简介:丁建新(1970-),男,湖南益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批评语言学、边缘话语分析、功能语言学研究。

通讯作者:陈柳(1985-),女,湖北松滋人,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英美文学研究。

①高文惠:《边缘处境中的自由言说——J.M.库切与压迫性权威的对抗》,《外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②Susan Gallagher. *A Story of South Africa: J. M. Coetzee's Fiction in Context*.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46.

③王旭峰:《库切与自由主义》,《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④蔡云,脱剑鸣:《析J.M.库切小说〈耻〉中的超越种族的生存困惑》,《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人和黑人被限制在各自的区域中,彼此憎恨。在白人眼中,黑人只能是徘徊于边缘的他者,是丧失了人性的物体,是黑皮肤的罪犯。而在黑人眼中,白人只能是既得利益者,是侵略者,是敌人。人类的共通性被抹杀。剩下的只有黑与白、主人与奴仆、高贵与低贱这类泾渭分明的对立。1994年,种族隔离制度宣告结束。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各方面的发展都呈现大倒退的状况,大批白人撤回宗主国,而留在南非的白人成为黑人复仇的对象。1999年小说《耻》出版,故事主要是围绕一桩农场暴力案件展开的。

白人大学教授卢里(David Lurie)到女儿露西(Lucy Lurie)的农场小住。虽然他热爱农场的田园风光,但他对“这个他者的、陌生的世界”^①十分不满。他认为露西身边的黑人愚昧而危险。在与他们见面时,他需要努力“摆出一副好脸”^②。一天他与露西散步回家,远远看见三个黑人男子站在家门口。旁边狗舍里的狗在狂吠。其中一个人说要借用电话,因为有人要生产,情况紧急。露西中计开门。三人闯进屋内,其中一个露西的黑人邻居佩特鲁斯(Petrus)的侄子。他们轮奸露西,杀光她的狗,将财物洗劫一空。在卢里的头部倒上甲烷并点火之后,开着卢里的车扬长而去。“相互的想象已遗失在街市中……这些暴徒不能想象露西是因为他们自以为已经认识她。在他们眼中,露西就是一个白人,一个有财产的女人和种族隔离制度的得益者。同理,在大卫眼中,这些黑人只能是强奸犯。”^③种族隔离制度使得黑人与白人对彼此产生了刻板而僵化的想象,罪恶也由此滋生。

袭击中卢里被暴徒用火烧头部,慌忙之中他将头埋进座便器取水以灭火自救。这对于白人中心主义情结极为浓厚的卢里来说“是一次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去势’(castration)”^④,他的田园梦至此也彻底破灭。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的核心指向之一是反田园,“田园书写来自欧洲的文学传统,

描写大自然的优美,讴歌人与自然的和谐,但在后殖民语境下,浪漫的田园美景却不得不与殖民创伤交织在一起。”^⑤《耻》是一种反田园书写。小说中,初到农场的卢里像殖民者一样欣赏着农场的田园风光,他将女儿露西看作是“旧式的、强健而年轻的殖民者”^⑥,而佩特鲁斯则是昔日的奴仆。“过去,农民靠牛和玉米为生。今天,则是靠狗和水仙花。世事变化越多就越是保持原样。”^⑦但很快他就发现这里绝非昔日任白人侵占、种植及讴歌的自在田园。白人在这里已经失去了话语权,而且处境也十分危险。

(一) 话语权的移置

露西的农场位于东开普省,巴纳德(Barnard)认为这一点值得重视。“在东开普省,语言的选择是更多种的,包括英语,南非荷兰语,科萨语,还有科萨人说的非正式英语。《耻》中的白人,在后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多语言环境中不得不做出语言上的极为困难的调整。”^⑧这种调整指的是在白人与黑人的对话中,由谁掌控话语主导权。殖民时期白人主导对话。而后殖民时期,黑人控制了话语。《耻》中,库切借白人中心主义拥护者卢里与新近崛起的黑人佩特鲁斯之间充满张力的对话展现了话语权力的移位。最典型的一例是农场遭遇袭击后两人的一场对话。

“你一定听说了吧,星期三我们被抢劫了。而你刚好不在家。”

“是的,”佩特鲁斯说,“我听说了。这实在是太糟了,太糟了。不过现在你们都没事了。”

他真的没事了吗?露西真的没事了吗?佩特鲁斯这是在问他?可他的话听起来不像是问题。但又能是什么呢?……

“我还活着,”他答道。“只要还活着就是没事了吧,我想。所以是的,我没事了。”他顿了顿,等待着,不说话,等佩特鲁斯开口问:露西怎么样了?

①J.M.Coetzee.*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 71.

②J.M.Coetzee.*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 72.

③Alice Brittan. “Death and J.M.Coetzee’s ‘Disgrac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10(3): 477 - 502.

④但汉松:《“与狗遭遇”:论库切《耻》中的南非动物叙事》,《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⑤朱峰:《发展、环境、动物:评《后殖民生态批评》》,《外国文学》2012年第5期。

⑥J.M.Coetzee.*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61.

⑦J.M.Coetzee.*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62.

⑧Rita Barnard and J. M. Coetzee. “J. M. Coetzee’s ‘Disgrace’ and African Pastoral”,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03(2): 199 - 224.

但是他错了。“露西明天上市场吗?”

佩特鲁斯这样问道。^①

对话中,卢里的期望反复落空,处处受制于佩特鲁斯。首先佩特鲁斯对暴力事件并不主动询问,反而是卢里按捺不住。接着佩特鲁斯虽应答了几句,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卢里预期中的真切关怀。最后卢里故意沉默,等佩特鲁斯关心露西的情况,但是他还是错了,佩特鲁斯对此并不过问。巴纳德和库切认为这段对话意义重大。在殖民田园主义中,白人与黑人的对话模式只能是命令与应答,而眼下卢里与佩特鲁斯的对话则大为不同。“(卢里)发现自己陷入了说话的困境,因为说话的规则变得难以捉摸。对话双方岌岌可危的关系处于深不可测又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佩特鲁斯说到底是‘他自己的主人’。他的这种新式且又十分矛盾的主体地位表现在他拒绝服从过去的对话模式,拒绝按照提问与回答、命令与反应的模式对话。”^②霍米·巴巴指出在面对殖民者的干预时,土著往往会有一种“狡猾的谦恭……这其实就是土著拒绝去满足殖民者的叙事性要求,从而挫败了殖民者的监控欲望和同化策略”^③。佩特鲁斯正是用这样一种顾左右而言他的说话方式回避了卢里的质问和怒火。对于多年相识的白人露西的悲惨境遇,他也无动于衷,更趁此机会夺走她的土地。法农(Frantz Fanon)在其著作《黑皮肤、白面具》中指出殖民史导致黑人精神已嬗变为白人结构。“他们有着黑色的皮肤,戴着白色的面具。”^④白人的殖民策略已进入黑人佩特鲁斯的思维模式中。对于露西所遭受到的种族报复,他如殖民者一般坚硬而冷漠。昔日的边缘佩特鲁斯已经认领了自己的新身份。

当卢里和露西还沉浸在暴力案件的阴影中时,佩特鲁斯开着卡车,满载建筑材料,准备建房子。“时代变了。”^⑤从中心到边缘,露西知道如果

没有佩特鲁斯的帮助,自己的农场不可能有繁荣的面貌。而卢里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心中的殖民者话语体系无法停止运转。“卢里用人类学的方式看待像佩特鲁斯这样的非洲人——他们是需要被审视的他者——卢里坚定地让自己站在欧洲文化这一边。”^⑥但另一方面,他清楚曾经高高在上的殖民者语言英语在南非已丧失优势地位。南非新政府成立后,卢里在大学教授的古典文学专业被撤销,大多数时候他只能硬着头皮给学生讲所谓的实用的交际技巧。“显然,在一个将西方文学课程(乃至西方人文精神)边缘化的新南非高等教育系统里,卢里引以为傲的英国浪漫主义激情和精神家园遭到贬斥并被急剧边缘化。”^⑦对卢里来说,英语代表着殖民时代清晰、稳固、毫无争议的的社会阶层结构,而今天南非的混乱现状已无法用英语来描述。当他被暴徒锁在厕所里,不能出去解救露西时,他无法说英语。“他说意大利语,说法语,但是这两种语言都无法将他救出此时此刻最为黑暗的非洲。”^⑧最后他只能发出干瘪的低嚎。面对无法用殖民者语言来表述的情形,边缘人卢里常常处于失语的状态。

(二) 土地的归属

后殖民时代,白人失去的不仅是话语权。土地的归属问题成为白人定居者与当地黑人之间矛盾冲突的焦点。殖民时期,南非的土地集中在少数白人手中。“1913年的《南非土著居民土地法》规定,除了农业工人,其他非洲人不得拥有或占用‘计划的土著区域’以外的土地。该法案导致了许多人无家可归,失去了谋生手段。”^⑨而“种族隔离制度取消后的‘新’南非进行了土地改革,其主要政治目标是到2014年确保30%的农业用地转让给黑人。但是政策的实施并不理想,转让速度非常缓慢,到2004年为止只有4.3%的农业用地

① J.M.Coetzee. *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p.114-115.

② Rita Barnard and J. M. Coetzee. "J. M. Coetzee's 'Disgrace' and African Pastoral",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03(2):199-224.

③ 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

④ 罗伯特·杨:《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容新芳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页。

⑤ J.M.Coetzee. *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117.

⑥ Deirdre Coleman. "The 'Dog - Man': Race, Sex, Species, and Lineage in Coetzee's *Disgrace*",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2009(4): 597-617.

⑦ 但汉松:《“与狗遭遇”:论库切〈耻〉中的南非动物叙事》,《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⑧ J.M.Coetzee. *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95.

⑨ 罗伯特·杨:《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容新芳译,译林出版社,2013,第50页。

回到黑人手中。这进一步加剧了黑人对白人的仇恨”^①,那些仍然拥有土地的白人成了被袭击的目标。暴力案件以后,露西无心打理农场。而另一边佩特鲁斯在扩张土地,购买机械设备。卢里希望露西能卖掉土地,远离野蛮与罪恶,“回归文明”^②。但露西最终决定以土地作嫁妆,成为佩特鲁斯的第三个妻子,换取生存空间。土地正是佩特鲁斯最迫切需要的,此前他一直住在露西的马棚里。

在卢里看来,露西放弃土地就等于背弃了自己的肤色、种族和阶层。白人几个世纪以来作为中心的尊严丧失殆尽。“正如批评家、法律历史学家艾里克·谢菲茨曾经十分有力地指出的那样,欧洲人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财产观念,一种拥有和占有财产的观念。这种观念与那些不能被同化到这个系统中的观念存在根本对立。游牧者在土地上游牧,与土地关联紧密,但从不把自己与土地的关系变成财产或占有关系。”^③露西本就是崇尚流浪生活的嬉皮士。在卢里帮她买下农场前,她靠跟着一群人四处流浪,贩卖陶土制品为生。而卢里对土地的占有意识极为明确,和过去的殖民者没什么两样。罗伯特·马泽克(Robert P. Marzec)指出帝国的圈地情结“本质上是西方人以土地为他者而建构起的主体意识”^④。在卢里眼中,土地就是白人在南非的立身之本,放弃土地意味着被彻底地边缘化。

露西唯一保留的是自己居住的房屋,佩特鲁斯及其家族成员被禁止像以前一样随意出入她的住所。这意味着暴力案件后,她清醒地认识到黑人对白人的觊觎并未停止。几百年来殖民者生活在被殖民者的仰视中,被殖民者则盼望着取代殖民者。小说表明佩特鲁斯极有可能是暴力案的共谋。多年来他作为帮手与合伙人深度参与了露西的生活,目睹了露西作为白人所拥有的一切物质

财富与社会特权。这对白人父女在自己的农场里烤着面包,看野鸭游过水库,每周六去集市卖水仙花。可以想见,这样的画面必定刺痛了黑人邻居的眼睛。库切的作品“审视了已数代定居于此的白人对土地日积月累的感情。对土地的占有意味着对黑人的掠夺,但是白人对土地的深厚感情并未因此而减弱。在后殖民隔离时代的政治环境下,‘回归土地的田园美景’总是与‘归还土地的政治要求’之间存在着张力”^⑤。当冲突爆发后,她将土地送给黑人,表明佩特鲁斯可以用任意的故事来解释她的身份。这意味着她放弃了身份,但似乎同时也获得了新的生存机会。巴巴指出:“正是在身份消退与其黯淡的铭写之间的这片重叠空间里,我获得了主体位置。”^⑥在后殖民时代,放弃土地意味着露西拥有了新的“居间”的身份,但这并不代表露西的困境已得到解决。身处后殖民语境,差异与矛盾已是常态。

二 后殖民动物的文化内涵:挑战西方理性传统

“哈根和提芬认为,物种主义和种族主义具有密切联系,因而,探寻人与动物间的界限对于颠覆殖民主义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⑦在这部“为作者获得 2003 年诺贝尔文学奖铺平了道路”^⑧的小说中,动物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后殖民语境中,动物是人类绕不开的话题。动物居于人类社会末端,可以说是最为边缘的群体。“后殖民语境下的动物意象都被打上殖民主义或反殖民主义话语的烙印,成为反映后殖民权力关系的载体。”^⑨但汉松指出:“《耻》中的狗是特殊的后殖民动物,携带着极深的非洲殖民史的烙印。”^⑩他认为在南非历史上白人对黑人的奴役与镇压中,狗始终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南非大概有三种犬类,从 19 世纪开始,血统纯正的布尔犬和背脊犬

①朱峰:《后殖民生态视角下的〈耻〉》,《外国文学研究》2013 年第 1 期。

②J.M.Coetzee.*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151.

③罗伯特·杨:《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容新芳译,译林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53 页。

④江玉琴:《论后殖民生态批评研究——生态批评的一种新维度》,《当代外国文学》,2013 年第 2 期。

⑤朱峰:《发展、环境、动物:评〈后殖民生态批评〉》,《外国文学》2012 年第 5 期。

⑥Homi 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56.

⑦朱新福,张慧荣:《后殖民生态批评述略》,《理论与争鸣》2011 年第 4 期。

⑧石云龙:《库切小说“他者”多维度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34 页。

⑨姜礼福:《寓言叙事与喜剧叙事中的动物政治——〈白虎〉的后殖民生态思想解读》,《当代外国文学》2010 年第 1 期。

⑩但汉松:《“与狗遭遇”:论库切〈耻〉中的南非动物叙事》,《外国文学评论》2018 年第 3 期。

被白人划分为“白种狗”，而杂交的卡非尔犬(kaffir)则成了“黑种狗”。白人政府、白人警察和白人农场都大量训养并利用“白种狗”镇压和威慑黑人。“白种狗”被训练成维护白人利益、看到黑人就会吠叫并随时准备攻击的暴力工具。当种族隔离制度被废除，大量的白人离开南非，也意味着相当数量的“白种狗”被遗弃在南非。露西所开办的狗舍里很可能就有这样的狗。卢里在想象黑人暴徒对露西施暴的情境时，他脑海中总能听见暴徒们大叫“叫你的狗来啊！”^①(Call your dogs!)虽然这只是他的想象，但也印证了在黑人眼中，“白种狗”的确是白人的帮凶。因此三个暴徒残忍地用枪屠杀了露西所有的狗。在《耻》中，表面上露西和伯图斯之间和睦的邻里关系、共赢的农场合作者关系已实现了新南非社会种族大融合的良好愿景。但小说中，每当白人的狗遇到黑人时，总是毛发竖立，高度戒备。这些后殖民动物身上折射出新南非社会中依然严峻的种族冲突问题。而从动物视角出发，殖民主义思想和话语得以更充分地批判与解构。

“在谈到动物研究与后殖民研究的紧密关系时，纳斯鲍姆(Nartha Nussbaum)指出，‘追求真正的全球正义需要我们将与我们生活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其他有感知物种纳入考量范围’。”^②正是人类与动物这一对古老的二元对立催生了种种看似正义、实则残酷的剥削与压迫。经由西方理性传统正名的物种主义正是种族主义滋生泛滥的温床。“人类对动物的剥削和利用与欧洲殖民者的殖民暴行并无二致。……物种主义是一种范围更广的种族主义。”^③在《耻》中，库切将人类置于众多的物种之中。人与动物并无截然对立，而是分属不同物种。当卢里离开学校来到农场，意味着他的栖居之地从文化转为自然。在这里，“人和动物重新回到‘物种’这个范畴相互审视对方”^④。库切面临着挑战，因为在西方理性话语中，动物及热爱动物的人被认为是毫无理性的，应该受到蔑

视和压制。

哈根和提芬指出：“18世纪的理性主义意识形态在帝国扩张和殖民制度的建立方面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理性’和‘文明’这两个基本的启蒙概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基于假设有明显的、顽固的物种边界线的存在。‘人类’的定义，确实依赖于而且仍然依赖于非人类、未开化、野蛮人和动物的在场。西方为殖民化正名正是基于这一点。”^⑤而库切摒弃了这一传统，让动物与人回归到平等的位置。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库切塑造了动物医生贝芙·肖这一角色。与小说中四处弥漫的阴影、不安与死亡不同，贝芙体现了完整、镇定和救赎。起初卢里反感贝芙，认为她贫穷、落后，与散发着臭味的动物住在一起。这种对动物气味的天然排斥是现代城市居民的特征。“没有牲畜的草坪和后院是与中产阶级紧紧联系在一起。”^⑥随着城市的发展，动物从居民的后院被转移到工人阶级和移民所居住的边缘地带，在那里它们没有阳光、空间和正常的食物，而是要面对难以想象的拥挤、脏乱和抗生素。在全球化进程中，动物遭遇了更为残酷的边缘化。

面对动物，卢里的疏远态度与贝芙的几近于“超自然的”关怀形成鲜明对比。在动物诊所，贝芙边医治动物边吩咐他：“从现在开始，你脑海中必须想着令人舒适与强大的念头，因为狗可以嗅到你的想法。”^⑦卢里认为这简直是胡扯。二人的不同可类比于经典思想(the Classical mind)与术师文化(the Magian culture)之间的差别。经典思想指的是希腊哲学思想，而术师文化则指的是活跃于地中海沿岸的另一旁支文化。“对于术师来说，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是与动物一起分享的……(而)经典思想承认我们是凡人……同时也鄙视与人类共处的动物。”^⑧两相对比，经典思想专注自我、强调理性，而术师文化则关注动物他者的存在、相信动物他者的价值。在经典文化中，人们被教导轻视动物，并且防止对动物产生不理性

①J.M.Coetzee.*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160.

②钟再强:《后殖民生态批评:回顾与反思》,《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③朱峰:《发展、环境、动物:评〈后殖民生态批评〉》,《外国文学》2012年第5期。

④但汉松:《“同伴物种”的后人类批判及其限度》,《文艺研究》2018年第1期。

⑤Graham Huggan and Helen Tiffin.“Green Postcolonialism”, *interventions*, 2007(1):1-11.

⑥Frederick L. Brown. *The City is More than Human: An Animal History of Seattl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6, p.200.

⑦J.M.Coetzee.*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81.

⑧Tom L. Beauchamp and R. G. Frey.*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imal Ethics (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48-49.

的喜爱。古埃及人正是因为崇拜猫,且创造半人半兽神像而被认为是不讲秩序和极其危险的。“对更加教条主义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来说,埃及人是受蒙蔽的动物崇拜者,可以想见,其习惯也更具兽性。动物、动物爱好者、野蛮人都必须被打败。人类应该知晓自身的位置本就与动物不同……每一个人作为个体,为了人类共同的理性,必须非常谨慎地压制自身的动物性。”^①卢里对贝芙和动物的轻视,是以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方理性传统的产物。这样的理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催生了物种主义和种族主义。它们是“后殖民生态批评学说的两个紧密联系的概念。前者不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后者不能在伦理的基础上善待动物等非人物种,两者都不能恰当定位人类在自然中的位置”^②。

三 动物生存范式的启示:重建想象

在动物诊所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卢里对动物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买了辆皮卡车,专门运送并亲自焚化狗的尸体,因为他不愿意看到工人们用铁锹拍打狗的尸体,也不愿意将狗的尸体扔在垃圾堆里。但同时他又对自己的行为感到不解,他竟然成了一个“为狗服务的人”(a dog-man):“一个狗的殡仪员”“一个狗的死亡之神”^③。他感觉到“再没有第二个人会如此愚蠢地来做这种事情”^④。科尔曼认为:“有尊严地焚化死去的狗是卢里对其人类中心主义逻辑的一种赎罪。他成了狗的仆人,社会最底层的贱民,甚至比最底层还要低。赋予狗尊严,尽管它们不知荣辱,卢里实际上是承认了人类与非人类物种之间的进化亲缘关系。”^⑤他放下了歌剧的写作、放下了诗

人的教导。“什么诗人,什么死去的导师,都到此为止吧。必须说,这些人并没有好好地引导他。”^⑥对于此刻的他来说,动物的启示似乎才是最宝贵的。他观察到狗吃东西的时候是非常平等而安静的。“几乎没有争抢,弱小的狗接受自己的命运,在一旁等待。”^⑦他正是从这样的场景中体会到自然的法则,接受了露西将一切都让给佩特鲁斯,像狗一样活着的事实。“卢里像达尔文一样,认可了人与动物之间进化的和情感的连续性……他接受了人类生活的动物性。”^⑧

巴特勒(Judith Butler)认为“一种新人文主义正是建立在强调‘共通的’肉体上的脆弱性的基础上”^⑨。袭击中,卢里和露西险些丧命。面对生命的脆弱与极限,他体会到动物与人类共通的受难与面对死亡时感受到的耻。在暴力事件发生的当晚,卢里在散发着猫的气味的沙发上入睡,尽管此前他每天都禁止猫爬上沙发。此刻的猫对卢里来说更像是一个同伴,他从猫的身上获得了精神力量。自此以后他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动物诊所里。在《耻》这个故事中,厘清动物与人之间关系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建设人与狗的同伴物种关系,也就为其他物种之间(当然也包括南非白人、祖鲁人、科萨人及其他有色人种)的共存提供了一种可资参考的范式。”^⑩也就是说,动物不仅是同伴,更是人类学习和参照的对象。露西坚信:“没有更高的生活(higher life)。我们与动物共存。这就是唯一的现实。”^⑪

面对暴力她选择让出土地,并生下暴徒的孩子。“宽恕必以不可能之名出现。”^⑫露西的“这些举动之所以慈悲正是因为它们是无端地,没有必

①Tom L. Beauchamp and R. G. Frey.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nimal Ethics (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43.

②朱新福,张慧荣:《后殖民生态批评述略》,《理论与争鸣》2011年第4期。

③J.M.Coetzee. *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146.

④J.M.Coetzee. *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146.

⑤Deirdre Coleman. “The ‘Dog - Man’: Race, Sex, Species, and Lineage in Coetzee’s *Disgrace*”,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2009(4): 597 - 617.

⑥J.M.Coetzee. *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179.

⑦J.M.Coetzee. *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p.84 - 85.

⑧Deirdre Coleman. “The ‘Dog - Man’: Race, Sex, Species, and Lineage in Coetzee’s *Disgrace*”,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2009(4): 597 - 617.

⑨Judith Butler. *Precarious Life: The Powers of Mourning and Violence*. New York: Verso, 2004, p.42.

⑩但汉松:《“与狗遭遇”:论库切《耻》中的南非动物叙事》,《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⑪J.M.Coetzee. *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74.

⑫Jacques Derrida. *On Cosmopolitanism and Forgivenes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p.32-33.

要的:令人费解的,不合理的,代价过高的”^①。不得不露西的这些看似十分荒谬的举动是受到了动物生存范式的启发。没有了土地,露西承认自己就像狗一样,“什么都没有。没有王牌,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②。但是她并没有被这样的前景吓倒,也没有听从卢里的安排逃离南非。她坚定地留在农场,拥抱了这种跟动物一般没有尊严的生活。“人类的特权就应该分一些给动物。”^③谁能否认‘尊严’实际上也是人类的一种特权呢?露西决定生养因仇恨和暴力而产生的孩子,这的确不是靠理性思考能作出的选择。但只要从动物的生存范式去思考,就知道露西的选择是一种本能。面对代表着理性的卢里,露西执着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坚硬的理性并不是万能良药。“社会意义空间是复调的(polyphonic)、多元的。理解并保持对片段、差异与边缘的敏感性,倾听边缘、点亮边缘、引导并包容边缘,或许才能弥合话语权带来的社会裂痕,才能真正奏响最曼妙的调和式社会和弦。”^④露西的选择开启了“最智慧的空间”^⑤。巴纳德认为社会互动应该在智慧空间内被引导。智慧意味着不僵化、不对立与不盲从,这对后种族隔离时期人们想象的转变与社会的转型十分关键。“只有不断地接纳本不可被想象的人事物,慈悲才能获得新生,否则它很容易就会沦落成一套封闭的常规,一种感性的和伦理的界限,没有灵活性可言。”^⑥也就是说《耻》中所举扬的爱或者慈悲具有动物性,并不是理性所能解释,但却是重建想象的希望所在。

对于露西的选择,卢里从起初的愤怒发展为最后的妥协。他的转变应该说是一种“从以自我为中心的、只看得见斗争与竞争的视角转向对……他异性的新的评估”^⑦。他逐渐放下焦虑

和不安。“跟贝芙一样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被安乐死的动物身上,给予它爱。而‘爱’这个字眼对以前的卢里来说是艰难的。”^⑧为了缓解和露西之间的紧张关系,卢里搬到镇上的出租屋里。偶然一次探望,他看见露西独自在花圃劳作,阳光和劳动让她突然显得健康起来。他很欣慰他的女儿变成了一个脚踏实地的真正的农民,不再担忧她无法生存。这一点值得注意,露西亲自打理花圃意味着她与泥土更近了,而这正是库切在其小说《铁器时代》中呼吁的:回到更柔软的时代、回到泥土时代。

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似乎意味着新时代的登场。但“这个时代罪行泛滥,警务低效,中产阶级封闭在自己的家中,家就是堡垒……我们终结了铁器时代,是否只是为了回到铜器时代?”^⑨《铁器时代》中的卡伦夫人深感20世纪80年代的南非社会满目苍夷。她在写给女儿的信中问道:“还要多久那些更加柔软的时代才会依次到来?粘土时代、泥土时代什么时候会来?”^⑩露西放弃了拥有土地的权力,但她没有离开泥土,甚至和泥土更近了。在后殖民语境中,对于露西这样一个柔软的、以动物生存范式为参照样本的人,旧式殖民者卢里的语言不断失去阵地,他的思想已无法引导露西的人生。此时,身体的物质经验似乎发挥了作用:“《耻》这样一部小说让人禁不住将东开普省想象成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文化转译的困境能够被身体经验克服:怀孕,田间劳动,以及居住在土地上的物质性。简而言之,这样的情景设置暗示了一种新的事物,尚未被观察者的描述性语言所接受。”^⑪在库切笔下,面对露西,卢里这位观察者的殖民者话语体系被瓦解。而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放下隔阂与敌对,关爱动物,期盼新生命。

① Alice Brittan. "Death and J.M.Coetzee's 'Disgrac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10(3):477-502.

② J.M.Coetzee. *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p.204-205.

③ J.M.Coetzee. *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74.

④ 丁建新,沈文静:《边缘话语分析: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年第4期。

⑤ Rita Barnard and J. M. Coetzee. "J. M. Coetzee's 'Disgrace' and African Pastoral",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03(2):199-224.

⑥ Alice Brittan. "Death and J.M.Coetzee's 'Disgrac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10(3):477-502.

⑦ Deirdre Coleman. "The 'Dog - Man': Race, Sex, Species, and Lineage in Coetzee's Disgrace",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2009(4): 597 - 617.

⑧ J.M.Coetzee. *Disgrace*. London: Vintage, 2010, p.219.

⑨ Derek Attridge. "Age of Bronze, State of Grace: Music and Dogs in Coetzee's 'Disgrace'", *Novel: A Forum of Fiction*, 2000(1):98 - 121.

⑩ J.M. Coetzee. *Age of Ir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0, p. 50.

⑪ Rita Barnard and J. M. Coetzee. "J. M. Coetzee's 'Disgrace' and African Pastoral",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2003(2):199 - 224.

卢里并不相信暴力,在农场遇袭以后,他们到相隔数十里的德国人埃廷格(Ettinger)的农场寻求帮助。埃廷格说现在不管去哪他都会带着自己的手枪(Bretta),因为在如今的南非,白人只能自救。卢里心生困惑:“埃廷格是对的吗?如果他当时也有枪,是不是就可以救下露西?他表示怀疑。如果他当时有枪,他很可能已经死了,他和露西都死了。”^①因为枪很可能会激怒暴徒,引发更为致命的暴力。当政治、诗人、暴力都不能解决南非的种族矛盾时,库切呼吁我们放下物种偏见,学习凝望动物,以仁爱之心攻克权力关系的坚冰。

结语

在小说《耻》中,殖民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给南非带来了难以愈合的社会裂痕。如铁般禁锢的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了,但人心如铁的事实却并未改变,因为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并不等同于族群问题的消失,在后种

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族群之间的隔阂乃至分层仍然显而易见,在人口密集、社会交往频繁的城市地区尤为明显^②,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敌对与仇视依然顽固。在这样的语境中,库切将动物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从动物的角度反思人的命运。农场的遭遇与动物诊所的经历都迫使卢里反思自己脑中根深蒂固的物种偏见。正是对动物的凝视与思考,卢里开始反思白人中心主义、反思自己对他异性的质疑与干涉。在库切的叙事中,没有物种他者的正义,要实现种族他者的自由很可能只是一个梦想。换言之,在一个文化语境中,人对待动物的态度揭示出这个社会是否具有对边缘群体的悲悯情怀。西方文明因其绝对理性传统而具有伪善性,库切要挑战的正是这一传统。正因为跨越种族、跨越物种的爱直到今天依然遥远,库切呼吁我们望向处于人类社会最底端的动物。当我们能够以仁爱之心对待动物的时候,或许就是我们能充分想象边缘、消除暴力的时候。

A Post-colonial Reading of the Marginal Groups in *Disgrace*

DING Jian-xin & CHEN Liu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J.M. Coetzee's *Disgrace* reveals the social landscape of the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In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of new South Africa, the whites lost their discourse and land; they fell into the edge of the society and lived as the animal others. Post-colonialism gives voice to the racial others and post-ecocriticism extends the scope of concern to animal others. From the post-colonial perspective constituted of these two theories, the marginal situations of racial others and animals others formed under the particular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South Africa are examined. In Coetzee's narrative, the life paradigm of animals sets a good example to the marginal groups which are searching for way out.

Key words: Coetzee; *Disgrace*; margin; South African whites; animals

(责任校对 莫秀珍)

^①J.M.Coetzee.*Disgrace*.London: Vintage, 2010, p.100.

^②王吴午:《开普敦的有色人“镇区”及其底边状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11期。